

就〈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與作者商榷

• 還學文

《二十一世紀》第4期劉青峰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文(以下簡稱劉文)討論本世紀初和十年改革中中國出現的兩次「科學主義」思潮,旨在揭示第二次「科學主義」興起及其鼓吹自由主義、衝擊官方意識形態的歷史功績。我想分別從事實和理論兩個方面來討論、分析該文的幾個基本論點,說明作者的上述提法不能成立。

兩點質疑

劉文以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為題,意在突出作為「當今思想自由化、衝擊官方意識形態的最大推動者」(頁32)的科學主義在中國第二次興起。為此,作者提出在這一時期官方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化」和民間科學主義興起中的自由化傾向為證。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這兩個論斷並不涉及理論問題,而是事實的錯誤。這裏僅從歷史事實角度提供說明。

(甲)是豐富馬克思主義,還是思想自由化?

——關於十年改革中非官方科學主義思潮的興起

劉文說,改革開放期間「在科學的名義下,西方現代哲學、經濟學、社會科學被大量引進。……如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都視為可以發展豐富馬克思主義的資源,被大加介紹和廣泛應用」(頁32),並由此得出結論:「我想,只要對中國十年思想發展具有實感,就不會否認『科學主義』是當今思想自由化、衝擊官方意識形態的最大推動者」。

在這裏事實和作者的結論是不一致的。十年改革中上述這一派「科學主義」旨在並且事實上也是在豐富馬

* 本文屬於「歐洲研究計劃——轉型中的中國文化與經濟」之論文系列,該計劃是德國大眾汽車公司資助的學術項目,主持人為魯爾大學東亞系馬漢茂教授。

克思主義，但它不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反對者，也不是自由化的推動者。道理很簡單，今日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顯然不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否定，因此從根本上說不構成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衝擊，更談不上自由化，因為自由化是與思想上和現實政治中的一元化互不相容、直接對立的。這一派「科學主義」思潮或許是「新」，但不過是「新」在「豐富」馬克思主義上，而不是批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潮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和自由化無關。

從科學主義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到科學主義「解構」了官方意識形態、導致思想自由化，這一推論在邏輯上和事實上都是不自洽的。

(乙)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復興」?!

——關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化

劉文提出一個「科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關係有歷史變遷的說法，作為宏揚和重新估價改革開放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據。

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科學主義」的關係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變化，並且在這種變化中改變了自己。根據作者：在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科學主義基本上是一種一元論的思維模式，具有「文化霸權的性格」，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頁33)；1949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成為大陸中國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一旦佔據主導地位，科學主義就會衰落」(頁40)；1978年以後科學主義再度興起，成為「『改

革開放』的哲學基礎」(頁32)，具有解構舊意識形態和建構新意識形態的進步意義和功能。

現在我們就1949年以後「科學主義的衰退」和十年改革中「科學主義思潮的第二次興起」這兩個階段，來看一看作者提出的「科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係的變化」究竟是不是歷史事實，她的詮釋有沒有道理。

文章提出自1949年馬克思主義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後，就與科學主義分離，呈現出官方意識形態中科學主義的衰退，表現為科學政治化。作者舉1949年以來大陸上對各種自然科學理論的歷次政治批判、「大躍進」時代「大煉鋼鐵」式的「群眾性的集體研究科學的運動」以及「畝產萬斤糧」式的向科學進軍為例(頁43)。不錯，1949年以來在大陸中國對遺傳學、相對論等一系列自然科學理論的批判都是政治批判，但是必須看到這種政治批判均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出發的。共產黨批判它們，不單批判它們不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而且首先批判它們是「偽」科學。這種政治批判並不表明共產黨意識形態中「科學主義」的喪失，恰恰相反，它表現了馬克思主義假借科學所表達的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政治上的獨裁的特徵。而「大躍進」、「大煉鋼鐵」等一系列瘋狂運動也都是打着科學的旗號，而不是以取消科學的名義進行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力」和它要求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正當性」理由都在於它自命的「科學性」上。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正是上述一切災難的罪惡之源。這種非科學的、偽科學的「科學性」和人們常識的科學概念完全不同。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常識的科學概念以及科學主義並沒有關係，另一方面馬克

今日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顯然不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否定，因此從根本上說不構成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衝擊，更談不上自由化。

1949年以來在大陸中國對自然科學理論的批判均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出發的。共產黨批判它們，不單批判它們不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而且首先批判它們是「偽」科學。這種政治批判並不表明共產黨意識形態中「科學主義」的喪失，恰恰相反，它表現了馬克思主義假借科學所表達的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政治上的獨裁的特徵。

思主義和它獨斷的偽科學的科學主義要求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分離。共產黨所發動的一切政治運動，如同共產主義這個制度本身一樣，有其深刻的意識形態背景。任何把現實的共產主義制度，共產黨的政治行為，和它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源割裂開來的看法，都是不切實際的。

關於十年改革中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主義化」，文章從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為標誌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共產黨科技政策的改變，這兩方面作了論述，並舉出下列事實為證。

一、在第一章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十年改革開放的哲學基礎，表明「思想解放派的理論是建立在『科學主義』立場上的」(頁32)，並援引事實說明了這種「科學主義」存在：「表面上看，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不過是回到正統的經典唯物論的立場，但這篇文章卻廣泛引用門捷列夫元素週期表、哥白尼日心說和海王星的發現，……顯然，這正好是那種把科學(知識和方法)看作認識一切社會文化現象和哲學理論前提的科學主義立場」(頁32)。然而，這並不能說明官方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化」轉變。這幾種科學發現的引證可以在50年代以來大陸上任何一本政治教科書中看到。共產黨一貫是這樣來標榜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的。這樣一種歷史的重複表明70年代末這場「真理標準」的討論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法根本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窠臼，拉上幾項教科書上的科學常識不說明任何問題。

二、涉及共產黨的科學政策，文章提出：「中國第二次科學主義是與

政治上『撥亂反正』相配合，其口號是回到馬克思那裏，具體表現為70年代末強大的唯生產論和經濟決定論思潮」(頁44)，例如當時的「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等口號，並且還提到「在西方學術中一直是象牙塔中的科學哲學，在中國居然會如此普及，甚至各級黨校的辯證法課程中都要講述」(頁44)，以此說明這個時期「科學主義在意識形態中佔舉足輕重的地位」。

十年改革中共產黨那樣一些政策口號的改變正如作者所說是「與政治上的『撥亂反正』相配合」，而且還是要「回到馬克思那裏」。雖然提法有所不同，但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上和現實政治中都沒有根本的改變，這在國內的高等教育和基礎科研方面都是顯而易見的。「唯生產論」和「經濟決定論」還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科學思想扯不上邊。作者特意強調「當時幾乎一切重大的改革都是在『科學地闡述馬列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頁44)。共產黨一直在「科學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在建黨初期、在「延安」時代、1958年「大躍進」時、文化革命當中，改革中重彈「科學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又說明甚麼呢？在大陸只有科學為闡述馬克思主義服務，而沒有馬克思主義科學化，「普及」到黨校的西方科學哲學也還是設置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課程下。這裏完全看不到作者所說的官方意識形態的科學化轉變。

文章在上述推理中犯了一個錯誤，即混淆了理論性格和事實關係這兩個不同的範疇。理論性格表述理論的邏輯特性。不論是世紀初、還是今天，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總是以其教條主

義的一元論和思辨形而上學的理論特徵與其他學說相區別。而作者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與科學主義關係的改變，涉及的是偶然的經驗事件：對理論存在的歷史環境的闡釋並不是對理論自身特性的說明，歷史環境的改變不等於理論的邏輯特性的改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性格不是經驗特性，也不是歷史的偶然，不會因歷史變遷改變或消失。

綜上所述，事實上並沒有作者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科學主義的衰退和復興的神話，而作者所推崇的十年改革中科學主義的第二次興起也並不是獨立的、自由主義的和反對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

關於「科學主義」、「唯物論」和「唯心論」三個基本概念

作者對世紀初中國出現的科學主義思潮的批評大部分不能成立，原因之一是作者對其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論意義缺乏瞭解。限於篇幅，這裏只就文中「科學主義」、「唯物論」和「經驗論」三個基本概念作一些簡要、提示性的說明。

(甲)「科學主義」就是對科學的誤解？！

作者從郭穎頤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摘引了幾個有關「科學主義」的片斷定義，隨即做出一個一般性概括「科學主義」首先是一種對科學的普遍推崇，而且它是基於對科學本質的誤解之上的。(頁34)。至於甚麼是「科學」，甚麼是「科學的本質」文中沒有其他進一步的說明。

作為一篇關於「科學主義」的專論，這樣的定義方式失之輕率。作者完全忽略了對「唯科學主義」的一般特徵，它和科學思想以及科學方法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說明。

近代科學方法的基本特徵在於它的經驗性、嚴密邏輯性和可操作性。泛指的「唯科學主義」是指通過對科學原則的普遍化而形成某種文化設定，例如對科學和進步的信仰。而把科學基本原則作不正當的推廣就導致「唯科學主義」，例如從物質性假定達到否定精神的實在性，一直達到唯物論的決定論。

把「唯科學主義」簡單化為「對科學的普遍推崇」，界定為「基於對科學本質的誤解」，本身就是對「唯科學主義」的誤解。這樣定義雖然對於作者立論方便，然而卻不符合科學思想史事實。

(乙)「唯物論」就是把科學理解為知識？！

劉文引用「唯物論科學主義」和「經驗論科學主義」兩個概念，斷言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對科學推崇的着重點不同」(頁39)，前者主要把科學理解為科學知識，後者則更強調方法」(頁39，黑體為筆者所加)。

把唯物論與經驗論的區別說成是把科學當作知識還是當作方法的不同，在哲學上是不着邊際的。在「唯物論唯科學主義」和「經驗論唯科學主義」這兩個概念中，「唯物論」和「經驗論」同樣是作為認識論概念說明「科學主義」不同的認識論特徵，兩者都同時包含知識觀和方法論兩種因素，並且也同時在這兩個方面彼此區別。劉文把「科學主義」解釋成為知識觀和方

事實上並沒有馬克思主義中科學主義的衰退和復興的神話，十年改革中科學主義的第二次興起也並不是獨立的、自由主義的和反對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

法論也是錯誤的，因為「唯科學主義」並不是認識論概念。

況且，作為樸素實在論的「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是兩回事。在經驗科學基礎上成長的唯物論思想，和經驗科學及其思想方法有密切聯繫，所以並不趨向極端的決定論和教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則超越了它理論的「物質」基礎——實在，即自然的實在、科學的實在和社會的實在，自稱是超越並制約直接現實的普遍有效的科學真理。如果它也算是科學的話，那麼它只能是一種脫離實在科學的「科學」。尤其是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其他所從出的思辨形而上學，辯證唯物主義就更流於空洞和詭辯。

(丙) 中國的經驗主義者把科學方法誤解為歸納法？！

對於中國的經驗論的科學主義流派，劉文援引林毓生批評他們「對科學方法有一個極大的誤解，即總把科學方法等同於歸納法」(頁39)，並且缺乏西方科學方法中那種懷疑精神。

關於中國的經驗主義者，歷史的真實和作者援引林毓生所作的上述判斷完全相反。也以胡適為例。作為世紀初經驗主義在中國的主要代表，胡適大力倡導實驗主義，鼓吹認識上和實踐上的經驗方法和批判態度。胡適認為，批判精神的價值不僅限於反抗傳統偏見，更重要的是要以此防止對任何思想的無批判的接受，為此他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倡懷疑、思索，力誠盲從。劉文批評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恰恰忽視了如何判斷某項事實是否可靠這一關鍵環節，胡適的方法充其量只是

一種擴展了的歸納法」(頁40)。然而在提出這個命題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胡適明確指出：假設和證驗都是科學方法不可缺少的主要分子，演繹和歸納是相互為用的。顯然假說並不就是歸納，否則無需「大膽」。沒有對所批評的命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本身作任何分析，也沒有說明胡適怎樣忽視了經驗事實可靠性的問題，甚麼是擴展了的歸納法，就做出了上述判斷，顯然是過分倉促和缺乏說服力的。

如上所示，劉文對中國科學主義思潮的若干批評，並不符合歷史真實，理論上也不能成立。

1991年5月

劉文批評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充其量只是一種擴展了的歸納法」，然而胡適明確指出：假設和證驗都是科學方法不可缺少的主要分子，演繹和歸納是相互為用的。顯然假說並不就是歸納，否則無需「大膽」。

參考書目

郭穎超：《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D.W.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65*)。

格羅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J.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胡適、余英時等：《胡適與中西文化》，台北，1987。

F. von Kutschera: *Wissenschaftstheorie 2. Band München, 1971; Grundlagen der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 1981*。

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商務印書館，1989。

還學文 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86年獲得聯邦德國雷根斯堡(Regensburg)大學哲學碩士學位，現為哲學博士候選人，專業分析哲學。